

古文字研究

高永祚



古 文 字 研 究

第 四 辑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胶 印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1/16· 17印张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9018· 114 定价: 2.35元

中華書局出版

古文字研究 第一輯

古文字研究 第二輯

本輯為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內容包括于省吾、唐蘭、張政娘、胡厚宣、張頴、朱德熙等同志以及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的論文、考釋、札記共二十五篇；日本學者島邦男、前川捷三的論著譯文二篇；甲骨學論著目錄（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一篇；另外還有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大會秘書組的公會議紀要及和新华社的長春專訊共三十篇。

本輯為唐蘭同志紀念專集，主要收入唐蘭同志未發表的長篇專著《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的手稿。此文考釋了數十件銅器銘文的文字和刻辭，研究了西周昭王時代的歷史和文化，對中國古代歷史、語言、文字、哲學以及考古教學研究工作有一定參考價值。

中華書局

出版

古文字研究

第三輯

古文字研究

第五輯

本輯共收文章十四篇，包括文字考釋、甲骨分期、討論、銅器銘文的釋文和滙釋、書評、資料。我國甲骨出土後流入日本的數量不少，很多都已經著錄。還有些流散在日本各地的，大多沒有發表，有的還原封不動地保存着。這次刊出的四百八十四片，不少就屬於這種情況。這一些，對古文字、甲骨刻辭的研究都是很好的材料。

本輯是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學術論文集的第三、第四部分，包括銅器銘文的考釋、語法、韻讀、滙釋，以及石刻、帛書、古璽、載書、繆篆文字研究的論文共十九篇，內容側重於金文和戰國文字。可供中國古代歷史、考古、語言、文字教學研究工作參考。

甲骨文合集

這是一部由郭沫若同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輯的大型甲骨文資料匯編。

甲骨文是我國商代王室進行占卜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卜辭或少數記事刻辭，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情況，是我國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從河南安陽小屯殷墟出土甲骨以來，已經七十多年，出土的甲骨已達十餘萬片。但在解放前出土的甲骨，多為私人收藏，有的為帝國主義分子所掠奪而流散海外。已經著錄的，不少重見迭出，印本不清，數量又少，不易利用；還有部分未著錄的，更不易見到。本書即是把七十多年以來近百種書刊所著錄的材料和分散在國內外公私收藏的少數流散的甲骨實物和拓本，已發表和未發表的，基本上都搜集起來，加以整理，校出重複，綴合斷片，對原有著錄盡量換用清楚、完全的拓本，按照一定的標準，分期分類進行編輯，力圖科學地體現出商代後期這一歷史階段的奴隸制社會的基本面貌。全書都是甲骨圖版，一律照原大照相影印。後並附有釋文、重要項目索引和有關圖表，可供檢查。

全書分裝十三個分冊，用120克膠版紙珂羅版印刷，全布面八開精裝，滌綸片護封，另加書套，由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第二、三、四、五、六冊已出版，第七冊即將出版。

目錄

| | |
|---------------------------------|-----|
| 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紀要（大會秘書組） | 一 |
| 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姚孝遂） | 七 |
| 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體演變（高明） | 四一 |
| 論羅振玉和王國維在古文字學領域內的地位和影響（陳煒湛 曾憲通） | 九一 |
| 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偽問題再商榷（胡厚宣） | 一五 |
| 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偽辨（于省吾） | 一三九 |
| 學習古文字散記（二篇）（夏 淦） | 一四七 |
| 甲骨文字考釋（八篇）（裘錫圭） | 一五三 |
| 卜辭文法三題（陳煒湛） | 一七七 |
| 說文武帝——兼論商末祭祀制度的變化（常玉芝） | 一〇五 |
| 釋七、甲（劉宗漢） | 一三五 |
| 周原卜辭選釋（李學勤 王宇信） | 一四四 |
| 釋卣（陳永正） | 一五九 |

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纪要

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六日在广州举行。这届年会由中山大学主办，是继去年在长春吉林大学举行的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之后，我国古文字学界的又一次盛会。出席本届年会的古文字研究人员工作者六十余人，来自吉林、辽宁、北京、四川、山西、陕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广东等十三个省市的三十多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考古文物和新闻出版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教授、香港大学的缪锦安讲师以及正在中山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加州大学周鸿翔副教授，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本届年会在筹备、组织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党委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由于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五十五周年，在校庆期间举行中山大学第十次科学讨论会，故本届年会也就纳入了中山大学校庆活动范围，统一加以筹划。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教授主持了生动活泼的开幕式，中山大学副校长黄焕秋、刘焯副校长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教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刘焯副校长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本届理事会的召集人、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向大会报告了年会的筹备经过，提出了开好大会的一些初步设想。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先畴同志向大会致了贺词。四川大学徐中舒教授、北京大学周祖谟、朱德熙教授等即兴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教授还即席赋诗，热烈祝贺大会的召开。开幕式结束后，容庚、于省吾、商承祚、启功、饶宗颐、孙常叙、马国权等学者都兴

致勃勃，挥毫题辞，以资纪念。

理事会的理事陈邦怀、罗福颐、马承源三位同志因健康或工作的关系未能到会，也给大会寄来了学术论文，陈邦怀同志还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诗。

会议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同志到会看望了与会全体同志，并同一部分老教授、老专家举行了亲切的座谈。

二

提交年会的论文共有五十五篇，其中包括古文字学理论、综述方面的论文七篇，甲骨文方面的论文十篇，关于铜器铭文方面的论文十五篇，关于列国秦汉文字方面的论文十四篇，其它方面的论文三篇，以及中山大学研究生的习作六篇。从论文的情况看，这次年会比起去年第一次的讨论会来，不仅数量增加了，而且涉及的范围更广了，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新见解。有些问题的研究也更深入了。这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古文字学方面新的研究成果。

有二十三位同志先后在大会上宣读或介绍了他们的论文，对古文字学中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余的同志也分别在小组会上宣读或介绍了自己的论文。饶宗颐、周鸿翔两位先生还向大会介绍了世界各国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文字的情况，引起了与会者的无比兴趣。

年会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解放思想、探讨问题的精神对各个方面的论文，对古文字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无拘无束的讨论。

在如何科学地考释古文字，建立科学的古文字学的体系方面，朱德熙、徐中舒、

夏淦（武汉大学）等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分别阐述了各自的看法。朱德熙同志指出，今后应当重视同一时期文字的比较和文字历史演变的比较。徐中舒同志认为，我国的文字学，许慎的《说文》打了个基础，考释古文字，要对文字的形音义三者综合考察；研究古代文字，还要懂得古代社会，懂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把几方面结合起来。周祖谟同志就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夏淦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许多前辈学者考释古文字是非常严谨的，我们应当把他们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加以总结和继承，使之发扬光大。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在古文字学领域里确实存在着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的问题。陈炜湛、曾宪通同志（中山大学）专题论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著名学者在古文字学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具体分析罗、王对古文字学的重大贡献及其治学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对于象罗、王这样学术上确有成就的学者，应将政治与学术严格区分开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加以评价，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这是当前古文字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古文字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姚孝遂同志（吉林大学）的论文《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对汉字的性质提出了新见解。他认为汉字在甲骨文时期便是表音文字，而不是表意文字。对此，不少同志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林沅同志（吉林大学）认为汉字是意音文字，并认为早期铜器铭文中的所谓“图形文字”也大多可以释读，同样具有文字的性质。朱德熙同志则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他们的不同观点，在会内外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高明同志（北京大学）和张振林同志（中山大学）在他们的论文中分别从不同的

角度探讨了古文字（偏旁及形体）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有关甲骨文的论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厚宣同志的《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一文特别引人注目。此文详尽叙述了《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一五〇六片大骨收藏和著录的历史情况，及各家对这片刻辞真伪的意见，并从各个方面论证此片所谓“家谱刻辞”全系伪刻。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在讨论中有不少同志对该刻辞的真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在甲骨文的断代分期方面，刘一曼等四同志（考古研究所）就武乙文丁卜辞的区分问题，李学勤、王宇信同志（历史研究所），袁仲一同志（陕西考古研究所）就周原卜辞的释读及断代问题，分别提出了论文，在会上展开了讨论。

提交年会的有关铜器铭文的论文大都是释读铭文的。于省吾同志的《墙盘铭文十二解》，对该铭的十二处疑难文句进行考释，提出了新的解释。赵诚（中华书局）、伍士谦同志（四川大学）也对墙盘和疾器的考释以及微氏家族铜器群的年代作了探讨。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同志详尽考释了周厉王时的胡簋。其它如麦尊、何尊、班簋五祀卫鼎等器的铭文，也都有同志提出论文，重加诠释。而刘启益同志（国家文物局）的《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更在小组会里引起了热烈的争鸣。

在列国秦汉文字如中山王诸器、侯马盟书、石刻、竹简、帛书、货币、铍印、缪篆等各个方面，本届年会都有专文加以论述。其中如徐中舒、伍士谦同志的《中山王宫堂图说明》、商承祚同志的《石刻篆文编字说》、马国权同志的《缪篆研究》、于豪亮同志（国家文物局）的《古玺杂记》、周世荣同志（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简牍文字研究》以及殷涤非同志（安徽省文物局）的《卢金与龟币》等论文都各有特色。

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许多同志认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可以也应该从各个角度对古文字进行研究。古文字研究与考古工作结合起来，二者要互相联系，密切配合。在会上，许多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同志展示了他们带来的实物照片、拓本等第一手资料，使有关问题的讨论更显得生动活泼。从语言的方面（语音、文法、词汇）研究古文字材料，目前还是较薄弱的一环，会议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同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与会的同志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年轻一代的古文字研究工作者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有的已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列席了会议。年会还收到了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的青年们给大会的贺信以及他们在业余时间自刻自印的刊物《古文字》，许多代表感到非常兴奋。青年们勤奋好学，不畏艰难的精神，正是我国古文字学后继有人的象征。

三、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本届理事会的理事唐兰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们事业的一大损失。唐兰同志在古文字学的理论方面，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兰同志生前还对古文字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整套的规划和设想。大家决心努力工作，以继承唐兰同志及其他老一辈古文字学家们的未竟之业。

会议建议一九八零年的年会由四川大学举办。大会一致推举徐中舒同志为一九八零年理事会的召集人，负责下届年会的筹备工作。

在本届年会的筹备过程中，日本国的神户大学伊藤道治教授、京都大学林巴奈夫教授等五位朋友也热切希望来华与会，大会筹备组也于上月发出了正式的请柬和电报，只因来不及办理有关手续，未能到会。对于台湾省古文字学界的学者，高承祚同志曾代表理事会发表广播讲话，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年会，切磋学术，只因种种原因，本届年会仍未能有台湾省的学者参加。与会同志一致希望，在下届年会上，将有台湾省古文字学界和日本等国的学者出席，以便和他们一起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学术问题。

与会同志高兴地看到，第一届年会的主要论文，已由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入《古文字研究》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公开发行；而且，《古文字研究》第二辑，第三辑也已编定付印。本届年会的主要论文，经过作者认真修改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将根据理事会的意见，连同本纪要，编入《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仍由中华书局印行。

四

我国古文字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光辉的未来。纵观去年长春讨论会以来我国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进展，目睹本届年会的盛况，与会代表们对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同志们一致认为古文字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今后，我们一定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古文字，批判地继承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使古文字研究工作迅速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使它在新长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坚信，经过老中青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古文字学一定会兴旺发达，人材辈出，硕果累累，一定能和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相称，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相称。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

姚孝遂

當前，每在談論到古代漢字性質的時候，無論是中國的或是外國的學者，一般都把它說成是表意文字。有些是自覺地專文加以申論；有些則是人云亦云，視為理所當然。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種結論是否正確？在作出明確答覆之前，有必要對幾個有關的基本概念弄清楚。

文字的不同發展階段

作為一種嚴格意義的文字，它必須是、而且只能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它必須有固定的讀音；其主要的功能只能是通過它所代表的語音來表達概念。

但是，文字並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經完備，具有它所應該具有的全部功能的。它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假若一種文字，它沒有固定的讀音，單純依靠原始的圖像來表達概念，或者說主要是依靠其符號的形體來表達概念，這就不可能是嚴格意義的文字，那只能是屬於文字的原始階段。前者我們稱之為「文字畫」，後者稱之為「圖繪文字」。它們都還不能完全勝任記錄語言的任務。我們還未曾發現古漢字有利用圖繪文字組成的完整句子。文字的發展過程，大體上經歷了以下這幾個階段：

- 一、表意文字
文字畫——圖繪文字
- 二、表音文字
音節文字——音素文字

「文字画」並未形成為符號，更談不上有固定的讀音，它基本上未能脫離圖畫的范畴。「圖繪文字」雖然也還沒有形成固定的讀音，但已經逐漸向符號的方向發展。儘管這些符號還是比較原始的，綫条化、規則化還非常不够，還不便於書寫，可是，它畢竟已逐漸脫離了圖畫，而跨入了文字的范畴。

在漢字的早期發展過程中，缺乏有「文字画」的資料。至於「圖繪文字」的資料，我們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銘刻中，往往可以見到。這種文字主要是通過其形體本身來表達概念，還沒有固定的讀音，這是名副其實的表意文字。下面不妨舉例來看一看。



《金文編》
799

很明顯，這像一個人右手持斧鉞，左手持倒人，乃是表示在某次戰爭行為中俘獲了敵人。其性質相當於一篇《孟鼎》銘文，或小臣穡刻辭。都是為了銘功頌德，不過具體而微罷了。如果有人試圖去考釋它相當於現代的哪一個字，那將完全是徒勞的。因為這個符號所要表達的概念，已大大超過了一個「詞」的範圍。



《金文編》
843

這種形體誰一看都能明白，从手持刀以殺豕，這應該是有關祭告祖先的銘刻，与

甲骨刻辭的「出豕于父甲」或「膚豕于匕庚」同一性質。

這些符號，容庚先生稱之為「圖形文字」是有道理的。（至於《金文編·附录上》所列舉的是否全都屬於圖形文字，則是可以討論的）其中有一部份作為氏族的徽號一直殘存在西周時期的銘文中，如：



等等。這些符號，都明顯地區別於當時通行的文字。

《甲》二四二二是一片習刻，其中有两个圖形作：



屈万里謂「本片諸辭及字，皆習書者所刻；故字皆拙劣，語不成辭。另刻圖像三：一為虎形，一為子象隨妊娠之母象形，又一則似獸又似蟲類，漫漶不甚清晰」。

屈万里的看法大體上是正確的，以為妊娠之象显然是誤解。習契者只是於空隙之處刻畫小獸之圖形而已。

儘管這些圖形是與其它文字同刻在一塊骨片上，一望即知為虎、象之形。我們認為，這不能稱作嚴格意義的文字。這是由於：

1. 作為文字符號，這些圖形尚未加以綫條化、規範化；
2. 這些都是孤立的圖像，還不能完全勝任記錄語言的作用，還不能利用這些圖

像組成一個完整的句子。當然並不排斥這些圖像是試圖達到記載某種事件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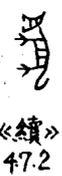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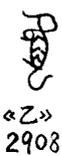
但是，如果說這些圖像與文字毫無關係，也是不夠恰當的。任何文字符號都有其發生、發展過程。在形成為一種嚴格意義的、表音的文字以前，有一個由圖畫到文字的過渡階段。人們利用某些客觀事物的圖像以表達某種思想，雖然是圖像與語言之間的關係還不十分緊密，但終究已區別於圖畫，而開始進入了文字的範疇。這还不能說是嚴格意義的文字，而是屬於文字的前期階段——表意文字階段。

這個界線是可以劃分得出來的。我們試舉虎、象二字為例：



《錄遺》116

這些圖形不是在句子中出現的，而是孤立存在的。



自《乙》二九〇八以下，都是出現在完整的句子中，其作為文字的線條化，符號

化過程是顯而易見的。



《金文編》534



《前》3.31.3



《後下》5.11



《乙》7645



師湯父鼎

《甲》二四二二屈萬里以為「母象形」，不稱之曰「文字」而稱之曰「圖像」是

有分寸的。《且辛鼎》的「象」形，《金文編》五三四列入象字下，固無不可。因為甲骨文、金文的「象」字確實是由此發展而來的。但我們認為，這些圖形都不能作為嚴格意義的文字。我們還未曾發現由純粹圖形文字組成的完整句子。

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

文字的發展階段，與文字符號的構形原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我們必須嚴格加以區分。文字的發展階段，是就文字符號的功能和作用所到達的程度來說的；文字的構形原則，是就文字符號的來源來說的。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似乎是不容易混淆，然而事實上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覺中却加以混淆了。

截至目前為止，除了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画和圖繪符號以外，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成體系的漢字要算商代的甲骨文。我們不妨拿這種最古老的文字來說明一下我們所要說明的情況。

從甲骨文文字的形體結構來看，毫無疑問，它是來源於客觀事物的圖像。有許多符號儘管已經線條化和簡單化了，但人們還仍然可以看出它是從某一事物的圖像發展而來的。例如：

| | | | | | | | |
|---|-----|---|-------|---|-----|---|------|
|  | (佳) |  | 本象鳥形 |  | (萬) |  | 本象蠋形 |
|  | (我) |  | 本象兵器形 |  | (東) |  | 本象象形 |
|  | (秋) |  | 本象蟋蟀形 | | | | |

如果從文字的形體來源來說，我們可以稱之為象形文字。但是，甲骨文是否就是通過它的形體本身去表達概念呢？這最好還是讓事實本身來作回答。